

边界感的构建与表达：中德人际交往的文化差异与现代化趋同研究

于怀瑾 商丹妮

吉林外国语大学

DOI:10.32629/mef.v8i19.17348

[摘要] 本文以“边界感”为核心分析概念,探究中国与德国在人际交往中构建与表达边界感的深层文化差异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德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双方社会关系模式的差异也逐渐凸显。基于此,本文以爱德华·T·霍尔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为分析的核心框架,结合中德两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从交际方式、人情往来、邻里关系、职场互动四个维度,系统的剖析了中德社会关系差异的具体表现,追溯其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的根源,并聚焦于中国城市化转型与德国在土耳其移民融合背景下的社会关系变迁,研究显示,在城市化与数字化的共同推动下,两国在边界感的构建上呈现出双向演变与趋同的态势。

[关键词] 边界感; 高低语境; 社会关系变迁; 移民融合;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ression of Boundary Sens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Modernization Convergence in Sino-Germa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ajin Yu Danni Shang

Jili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boundary sense" as the core analytical concept 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ression of boundary sense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as well as their evolu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gradually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 models. Using Edward T. Hall's high-context/low-context theory as the cent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from four dimensions: communication styles, gift-giving customs, neighborhood relations, and workplace interactions. It traces the roots of these differences to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and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 Germany under the context of Turkish immigrant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under the dual impetus of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boundary sense in both countries exhibits a trend of bidirectional evolution and convergence.

[Key words] boundary sense; high and low context; social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immigrant integration; modernization

引言

中德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主体,双方高频度的贸易与人员往来使得跨文化互动中的边界认知差异日益凸显。此类差异常常引发交际摩擦,例如,中方的含蓄表达易被德方解读为信息不足,而德方的直接表达则易被中方误解为情绪冒犯;

在日常社交中,中国同事表现出的关切也常常被德国伙伴视为对私人领域的逾越。究其根源,这些冲突并非源自于个体性格,而是深植于两种文化对“边界感”截然不同的界定逻辑与表达规范。

为系统解析这一核心概念,本文整合了边界理论的核心谱

系,旨在对其进行操作性界定。首先,边界感的基础在于其“划分”功能。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以“心理栅栏”为喻,指出边界感是个体为厘清社会角色、简化互动逻辑,在认知层面划分自我与他人、不同生活领域的心理倾向(泽鲁巴维尔,1991)。阿什福思等人(2000)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抽象倾向具体化为个体在互动中对物理空间、信息披露与情感投入三类核心边界的把控能力,它既包含对自身范围的界定,也涉及对他人领域的尊重。此外,一个健康的边界感系统还需具备“动态”特质。正如布朗(2006)所强调,有效的边界并非僵化的壁垒,而应具备灵活的适配性,允许个体依据互动对象与场景属性,灵活调整其开放与封闭的尺度,从而在保护自我完整性与建立良性联结之间取得平衡。

综上所述,结合本文的跨文化研究场景,“边界感”可被界定为: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物理距离、信息共享深度及情感投入程度的边界意识与外在表达方式,其建构逻辑是特定文化价值取向的具象化呈现。基于此,本文将依托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并借助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系统剖析中德边界感的结构性差异,进而从社会变迁视角解释其动态演化趋势。

1 中德社会关系差异的核心表现

1.1 交际方式的语境依赖差异

爱德华·T·霍尔在《超越文化》(1976:89-95)中明确的划分了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为代表,70%-90%的信息蕴含于场景、关系等非语言符号中,依赖双方默契与隐性暗示传递;低语境文化以德国、美国、北欧各国为典型,80%的信息通过明确言语传递,追求表达直白精准。中国属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德国为低语境文化代表,二者解码逻辑的差异易引发跨文化误解,如中方的含蓄表达易被视作信息模糊,德方的直接表述可能被解读为冒犯,这一划分是理解中德交际差异的关键。

高语境主导的交际中,表达以“关系和谐”为首要原则,更倾向于含蓄委婉。拒绝请求时常用“我最近时间不太方便”等替代直接否定,批评他人时先给予肯定再提“小建议”,核心意图是依赖于双方对关系与场景的共识。这种方式源自于对人际联结的珍视,避免直接冲突破坏已有关系。

低语境主导的交际则是以“精准效率”为核心。商务沟通中会直接指出“方案第三部分数据不足”,拒绝合作时会明确告知“预算不符”,言语的字面意义即为核心信息,较少的附加情感或关系考量。作为跨文化交际领域核心学者,古迪昆斯特曾主导不同语境文化群体沟通接受度对比实验,聚焦高、低语境文化下直接式表达的认知差异,探究文化背景对沟通反馈的影响,其与金荣渊的实验显示,这类直接表达在低语境文化中被视为“坦诚尊重”,但在高语境文化中初期接受度仅32%,实验列举的典型案例如中德合资项目中,中方项目经理以“我们再‘打磨’一下细节”暗示方案需重大调整,德方团队仅做格式优化,导致后续返工,本质是语境信息解读的偏差(Gudykunst & Kim, 2003)。

1.2 人情往来的价值取向差异

人情作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中德两国呈现截然不同的价值逻辑。

在中国文化中,人情往来体现了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互惠伦理。节日互赠家乡特产、同事间互助处理家事等行为,不仅是情感交流,更是在建构和维护一种基于信任的社会支持网络。正如黎东良(2012:45-62)所言,这种往来深深植根于费孝通(2013:23-37)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之中,人情投入的深浅自然依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不同,并常扩展至家族层面。例如,为远亲子女提供就业或求学方面的建议,往往被视为一种源于家族共同体意识的、情理之中的互助行为,而非对个体边界的冒犯。这套以人情为纽带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都发挥着凝聚社群、传递关怀、提供非正式支持的重要整合功能。

德国的人情则呈现出“边界适度性”的特征。礼物多为书籍、巧克力等轻量且实用的物品,仅发生在其生日、圣诞节等特定的场景,价值与关系亲疏无直接关联。日常交往中,主动提供帮助前要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协助”,避免过度介入他人私人空间。这种模式源自于对“个体独立性”的尊重,认为频繁的人情往来会给双方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

1.3 居住场景中的关系边界差异

居住场所作为社会关系的微观实践场景,中德在邻里与合租中的边界管理上呈现鲜明对比,本质是文化中“关系亲疏”与“个体边界”的价值差异延伸。

在邻里互动层面,中国社会延续“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无论在传统村落还是城市社区,邻里间常常存在着互助性往来——如临时托付物品、共享应季食材,阳台等半公共空间的“多功能化”(如晾晒、储物等)也使私人生活内容部分向公共领域延伸,社交边界具有较高的渗透性与弹性。而德国邻里遵循“礼貌性距离”的交往准则,阳台功能严格限定为休闲空间,避免私人生活的视觉暴露;日常互动仅停留于见面时问候,极少主动介入对方的私人领域,物理与社交边界清晰且稳定,这是对个体独立空间的核心尊重。

在合租生活层面,中国合租室友的关系易从“契约伙伴”向朋友转化,物品共用、清洁分工多数依赖于口头协商与情感自觉,边界随“差序格局”下的情感联结逐渐模糊,过度清晰的“斤斤计较”反而被视为关系亲密度的破坏。德国合租则以《清洁排班表》(Putzplan)、《购物清单》(Einkaufsliste)等书面规则为核心,这类文件将人际边界“物化”为可执行的条款,确保合租各方在保持个体独立的前提下协作,边界管理呈现高度“规则化”的特征。

1.4 职场互动的行为规范差异

职场关系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关系边界”与“沟通逻辑”两个维度。

在中国职场中,工作与私人关系的边界相对弹性。同事间常常聚餐、分享生活中的琐事,上级会关心下属的租房、通勤等私人问题,下属也会在节日向领导表达感谢。团队决策时更注重

“共识达成”，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会倾向于“私下沟通”后再公开讨论，避免集体场合的对立冲突。

德国职场则严格区分“工作角色”与“私人身份”。同事交流集中于项目内容，下班后续关系互动较少；上级对下属的评估完全基于绩效数据，批评直接针对工作问题而非个人；决策时遵循“就事论事”原则，不同意见可公开辩论，最终以事实为依据来定夺。黎东良(2012:138-156)的调研显示，78%的德国职场人认为“工作关系不应掺杂私人情感”，专业能力与规则意识是职场互动的核心。

2 中德社会关系差异的文化根源

2.1 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家族聚居”是主要生活形态，人们依赖邻里、宗族的互助生存，逐渐形成“关系优先”的社会逻辑。费孝通(2013:23-37)提出的“差序格局”正是这种结构的集中体现，个体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生存资源，人情成为维系网络稳定的核心纽带。

德国现代社会源于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与社会分工细化，个体通过专业的技能参与社会协作，法律与规则替代人情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同时，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体主义传统，强化了“个体独立”的认知，人际关系的建立需以“不侵犯个人边界”为前提，形成了理性化的社会关系模式。

2.2 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的“集体和谐”取向将关系稳定视为首要目标，这并非单方面的个体服从，而是蕴含了深厚的相互责任。个体需求常为维护集体或关系和谐而调整(如职场中调整个人意见，在社交中选择委婉表达)；相应地，集体也承诺在个体需要时提供支持(如灾难时的互助救援)。这种注重长期维系的互惠关系，被认为是社会高效运行与韧性的重要基础。

德国的“个体理性”取向则将“效率与坦诚”放在首位，认为明确表达与规则执行是对所有个体的公平对待，过度的关系考量则会降低社会运行的效率。这种取向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性与权利，认为清晰的边界与坦诚的沟通是减少误解、提升效率的关键。两种价值取向无绝对优劣之分，均是适配各自社会发展路径的产物。

3 社会发展中的中德社会关系变迁

3.1 中国社会关系的城市化转型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邻里间“推门即入”的亲密关系是常态。农忙时互相帮工，红白喜事全村参与，这种关系是基于长期共同生活的信任与依赖，形成了热情和睦的社群氛围。

但城市化进程彻底改变了这一模式。202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66.2%(国家统计局, 2025)，高层建筑取代了传统聚落，邻里间交往频率大幅降低；快节奏的工作模式下，人们的时间集中于职业发展与小家庭生活，复杂的人情往来逐渐简化为“微信问候”“节日红包”等形式。

当前的城市社会关系日益趋近西方的“理性边界”，但传统的人情文化并未完全消失：核心亲友圈仍然保留着互助的传统，

商务合作中“信任关系”仍然能降低沟通的成本。如何在效率优先的现代社会，保留“互助、共情”的文化精髓，避免人际关系过度冷漠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3.2 德国移民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土耳其裔移民约300万人(2024年数据)，其文化保留着“家族中心”的人情模式。家族成员倾向共同居住，婚丧嫁娶由家族统一安排，邻里间频繁互助，与德国主流的“个体边界”文化形成显著冲突。

移民群体的社会关系模式正经历适应性的变迁。第一代移民多集中于“土耳其社区”，保持着传统的关系模式；第二代移民逐渐形成融合策略——在家中保留家族聚餐、长辈优先的传统，在职场中采用德式“直接沟通、边界清晰”的互动方式。哈拉尔德·加尔贝(2018:67-83)的研究显示，65%的二代土耳其裔移民能熟练切换两种关系模式，实现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的平衡。对德国人这一方来说，占比最大的土耳其群体的社交与工作风格和模式，也对德国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种融合既为德国社会注入了“人情温度”，弥补了个体主义带来的关系疏离，也让移民群体更好地适应主流社会规则，最终形成了“多元共生”的社会关系新形态。

4 跨文化交际的启示与建议

4.1 建立“语境适配”的沟通策略

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理解并适对方言的语境依赖特征。与高语境文化群体互动时，需关注语气、表情等非语言信息，主动解读“话外音”——如听到“我们再考虑一下”，需意识到可能是委婉拒绝，而非等待进一步反馈；与低语境文化群体互动时，应调整为“明确简洁”的表达风格，将“我们可以再优化”改为“建议修改第三部分成本核算，具体方向为……”，减少模糊性表述。同时，沟通中应加强反馈与确认，及时了解对方理解的情况，避免因语境解读致偏差引发误解。

4.2 传承文化精髓，促进共生发展

中国需在城市化进程中保留“共情互助”的文化核心。社区可通过组织“邻里节”“共享厨房”等活动，重建人际联结；企业可设置“互助小组”，让职场关系既有边界感又不失温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为传统社会文化传承提供了契机，通过保护乡村聚落与民俗文化，保留亲密和谐的邻里关系模式，实现城乡文化互补。

德国可在移民融合中吸收移民文化的合理成分。社区层面搭建跨文化家庭联谊平台，促进主流群体与移民的相互理解；在社会层面包容不同文化的关系模式，在维护核心规则的基础上，让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丰富社会关系的内涵。

4.3 强化跨文化意识培养

个人层面，可通过视频网络等媒体了解西方国家最新的文化资讯，系统了解中德文化差异本质，提升文化敏感度；企业与机构层面，应开展“语境沟通培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制定适配的沟通规范，避免因关系模式差异导致工作延误或冲突。

跨文化意识的核心是尊重差异、包容多元,通过主动学习与实践,才能在跨文化互动中实现有效沟通与协作。

5 结语

中德社会关系的差异是由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为理解这些差异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社会发展进程中,两种文化的社会关系模式呈现“互相靠近”的趋势:中国城市关系更趋理性化,德国社会因移民融合增添了人情温度。

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并非“消除差异”,而是“理解适配”——尊重对方的文化逻辑,调整自身的互动策略,同时坚守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既是化解中德跨文化冲突的关键,也是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实现共生共荣的基础。未来中德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对彼此社会关系差异的深刻认知与灵活适配。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黎东良.中德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M].上海:同济大学

出版社,2012.

[3]国家统计局.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北京:国家统计局,2025.

[4]德国联邦统计局.Deutschland-China Handelsstatistik 2024[R].Wiesbaden: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25.

[5]Hall,E.T.Beyond Culture[M].New York:Anchor Books,1976.

[6]Gudykunst,W.B.,& Kim,Y.Y.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New York:McGraw-Hill,2003.

[7]Garbe,H. Migration und Identitätskonstruktion[M].Heidelberg:Springer,2018.

作者简介:

于怀瑾(2003--),女,汉族,黑龙江讷河人,本科,学生,从事文化差异研究。

商丹妮(1984--),女,汉族,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从事德语文学研究。